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 — 1787

美利坚  
共和国的缔造

1776 — 17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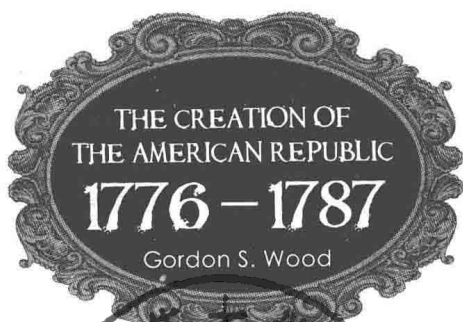
[美国]戈登·S.伍德著

朱妍兰译

Gordon S. Wood

# 美利坚 共和国的缔造

1776 — 1787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 1776—1787 / (美) 伍德 (Wood, G. S.) 著; 朱妍兰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4

(西方政治思想译丛)

书名原文: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

ISBN 978-7-5447-5978-6

I. ①美… II. ①伍… ②朱… III. ①政治制度史—研究—美国—1776~1787  
IV. ①D7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86142号

---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 by Gordon S. Wood

Published for the Omohundro Institute of Early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Copyright © 1970 by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new preface copyright © 1998 by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Published i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27514, USA

www.uncpress.unc.edu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4-120号

---

书 名	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 1776—1787
作 者	[美国] 戈登·S. 伍德
译 者	朱妍兰
责任编辑	王 蕾
原文出版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8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8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42.5
插 页	4
字 数	528千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978-6
定 价	98.00元

---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丛书主编 李 强

丛书编委 (按汉语拼音排序)

贝淡宁 (Daniel Bell) 曹卫东

丛日云 冯克利 高全喜 霍伟岸

刘 擎 秋 风 任剑涛 王 焱

## 丛书序言

自东汉末年佛教东传,梵客华僧,络绎于途,翻梵为秦,流布天下,极大地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发展。前贤移译异域经典的努力,不仅令后人钦仰,也为我们留下不灭的典型。

近世海通以降,特别是晚近二三十年来,译介西方政治理论的著作已经蔚成风气,但近来学界翻译的选目,却多偏重于当代作品。此中似乎隐含着这样一些理据:其一,当代理论关注现实问题,往往有较高知名度,读者会更加认同。其二,自进化论在近代传入中国后,国人对“进步”的观念坚信不移,认定新学问必然代表知识进化的更高阶段,包含更高、更全面的真理。但是,这种厚今薄古、贵近贱远的倾向,往往会忽略政治理论中一些最深层的问题。

所谓政治理论,在本质上就是关于秩序的理论。人类秩序之构建至少必须处理三方面的问题。第一,认同问题,涉及个体与群体、群体之间、人类与超越价值之间的关系等;第二,政治制度问题,涵盖诸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统治权威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政府内部之结构功能与运作等;第三,公共政策问题,涉及政府在具体问题上的政策原则、目标及实施程序等。若如此理解政治理论,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视界便显得颇为狭窄。当代西方社会由于基本完成了制度构建的历史使命,认同问题似乎也不构成困扰他们的主要问题,故而其政治理论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公共政策

方面,即探讨“谁应该得到什么”的问题。假如这样一种狭窄的理论视角构成汉语学界心目中西方政治理论的景象,恐怕无法真正理解西方现代政治的构建原则,无法理解现代政治秩序形成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对我们思考中国问题难以提供有意义的启迪。

为了弥补国内政治理论翻译中的这些缺憾,使读者对西方政治理论的历史演进与复杂内涵有更全面的理解,这套丛书希望从理论、历史、制度相结合的视角,选择译介西方政治理论中的重要著作。丛书关注的重点是政治思想,但在考察思想时,更加注重历史与制度的视角。它强调将政治理论放在历史的情境中理解,考察理论得以产生的背景及试图解决的问题;它关注历史的多样性与理论的复杂性,而不试图仅仅以理性为基础抽象出亘古不变的政治原则。它在历史考察中强调理论与制度的结合,既关注一个时代政治制度的结构,又力图展示重要思想家对当时制度的理论思考,从制度与理论结合的视角探索西方现代政治的历史演化轨迹以及隐含的原则。

我国中古时代,人们对于移译佛教经典,曾经有经、律、论三藏何者为先的讨论。晚近提倡阅读西方经典原著也成为一时潮流。然而,对于这些来自异域殊方的原典,如果缺乏历史语境的背景知识,难免望文生义,难解真义。有鉴于此,我们这套丛书,也将精选一些重要的二手研究著作,以促进读书界对于原典的真正理解。

译丛之设,已有很多。这里略述编辑旨趣,求其友声。究极而言,是为了假自他之耀,更全面地展示西方政治发展与思考的全貌,为国人思考政治问题尽绵薄之力。

## 戈登·S.伍德和他的《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sup>①</sup>

李剑鸣

前些年,国内史学界对“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很有兴趣,不少人写文章介绍和讨论他们的“语境主义”方法;政治学者则热衷于谈论共和主义理论,一时间使得波考克、佩蒂特等人在中国学界声名大振。其实,无论是就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而言,还是在共和主义的“重新发现”方面,两位哈佛出身的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和戈登·S.伍德,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两人是“师徒”关系,而且贝林的《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和伍德的《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1776—1787》,在内容和思路都是前后衔接、相互发明的。但是,国内学术界并没有充分重视他们的研究。数年前,贝林的书出了一个中译本,可是并没有激起多大的反响。现在,伍德的著作也有了中译本,期待这一次能引起足够的关注。

戈登·S.伍德于1933年出生在马萨诸塞的康科德,1958年进入哈佛大学,随伯纳德·贝林研究美国早期政治史。1964年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他先到密歇根大学执教,后来转到罗得岛的布朗大学,一直工作到退休。伍德和贝林一样,著述不是以量取胜,迄今出版的著作不到十种,其中两种还是已刊文章的结集。他的成名作《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1776—1787》(以下简称《缔造》)获得了美国史学界的最高奖项“班克罗夫特奖”;第二本书《美国革命的

---

<sup>①</sup> 本文系根据笔者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的《戈登·伍德与美国早期政治史研究》一文改写而成。

激进主义》(有中译本)则荣膺“普利策奖”;其他著述如《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美利坚化》、《自由的帝国》、《美利坚的理念》和《过去的用途》等,也受到了美国史学界不同程度的重视。

《缔造》是伍德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目前看来也可能是他治史生涯的巅峰之作。这本书的基础是他在贝林的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原来的标题是《革命时期美利坚政体的缔造》(*The Creation of an American Polity in the Revolutionary Era*),五年后正式成书出版时,改作《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这一改动不仅使文字更加简洁,而且使主题更加明确,气势更加宏伟。这本书涉及的问题甚为庞杂,而基本的立论则具有突出的宏观性和概括性:在1776—1787年间,美国革命一代人不仅构建了一种新的政府体制,而且形成了一套全新的政治观念,这就是独具特色的“美利坚政治体系”。<sup>①</sup>伍德的本意是通过比较1776年各州立宪中的争议与围绕1787年宪法的辩论,以凸显这十余年间美国政治文化的巨大转变,但随着论述的展开,触及的问题越来越多,几乎涵盖美国政治思想的所有主题。结果他就把《缔造》写成了一部鸿篇巨制,展现了美国革命时期政治文化变动的气象宏伟而色彩驳杂的画面。

伍德研究的起点正是贝林止步的地方。贝林在《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中,探析了殖民地反英话语的来源和转化,在十八世纪英国反对派思想与革命初起时的意识形态之间,建立了富有新意的事实关联。<sup>②</sup>伍德沿着这一思路来讨论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根据他的论述,美利坚人在革命初期接受了英国辉格派的“政治科学”,抱有“自由—权力”二元对立的观念,力图借助英国的宪政资源来抵抗英国的“暴政”,重建在英国已被腐败和压迫所破坏的政治秩序,以维护人民的自由。但是,随着这一重建过程的展开,美利坚人对政治世界的理解和想象逐渐与英国人分道扬镳。他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绝无可能简单地移植英国宪政,“美利坚的事业”注定是一种创举,就

---

① Gordon S. 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9, viii.

② 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共和主义世界。这种共和主义既是一套政治原则和一种政府框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社会理想,而且,这些不同层面和维度的共和主义乃是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的。在革命的进展中,美国社会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尤其是美德的脆弱和腐败的滋生引起了革命者的深切担忧。他们开始剔除共和主义蓝图中的乌托邦色调,进行新的政治探索,并用新的观念来看待和理解这种新探索的意义。这一过程始于各州的制宪,完成于联邦立宪。革命者一面进行体制上的摸索,一面进行观念上的推敲。一开始,他们着力于削弱和限制行政权,淡化甚至取消议会上院,并追求司法权的独立,其目的都是削弱和限制殖民地时期受人憎厌的总督主导的权力格局。可是他们慢慢就发现,共和政府的构建并不只是抛弃君主制和贵族制的遗产,而且还要对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做出全面的、深刻的重新界定,其中涉及立法机构的性质、代表制、混合政府、两院制和宪法等一系列问题。他们开始质疑英国的议会主权论,强调人民主权,特别是人民制定和批准宪法并创设政府的权力,开始把政府各分支的成员都视作人民的代理人,并力图制约他们代表民意的程度和方式。到1787—1788年联邦立宪时,利益和观念的交锋更加激烈,联邦主义者追求的体制及其相应的政治观念最终得势,“美利坚政治科学”的框架也就基本确立。

具体说来,在政治原则的层面上,革命初期美利坚人通常把作为同质整体的人民与政府对立起来,相信只有抑制和防范政府权力的专断和扩张,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到了联邦立宪时期,人们发现美国社会的构成十分复杂,人民并非一个同质的整体,而是包含许多不同的利益群体;再者,政治世界的斗争主要不是发生在人民与政府之间,而是存在于人民之中;人民的美德不再是共和政府的可靠保障,必须借助适当的制度来防止共和制的腐败和衰朽;这时,关键的问题不再是保护人民不受政府的压迫,而是防范人民中的多数人对少数人加以侵害,因之必须对人民的权力以及人民授予代表的权力加以提防和限制。在制度设置的层面上,美国革命者普遍相信,唯有民主共和属性的政体最适合美国,而这种政府的基石和轴心乃是代表制;由于契约不再是在人民与政府之间,而是在人民中间订立,因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界限已被打破,政府不再是嵌入社会而专属某一阶层,而成了超脱于社

会之上的利益调节器,因而须以功能性分权取代等级分权,以实现对人民代表的权力的防范和制约。这样一套政治理念和制度设计具有突出的美国特色,也显现了鲜明的现代性;它吸收并改造了来自英国的观念,增添了新的内容,超越了古典的和中世纪的政治理论。这就是说,革命期间美国人的政治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政治文化的面貌也已焕然一新。这一转变的动力不是来自书斋里的思想家,也不是某一套政治理论在美国社会传播的产物,而是许许多多政治人物的行动和思考逐渐累积的结果,并且他们的行动和思考深深地嵌入了复杂而剧烈的现实政治变动之中,伴随着激烈的利益和观点的博弈与交锋。

《缔造》于1969年初版时,伍德还只有三十六岁,算是一个学术新人,年纪轻轻就写出了这样一本足以跻身经典之列的著作,不免令人艳羡。有论者指出,伍德的书是新旧结合的产物:他在“新”社会史兴起的时代研究“老”政治史和思想史,采用“新”方法和“新”路径来探讨“老”题目,这种新旧的冲撞和结合,使他获取了意想不到的学术能量。<sup>①</sup>的确,伍德幸运地赶上了一个史学范式变革的时期,一方面,传统的课题和材料还没有被彻底耗尽;另一方面,相关学科新的理论和方法初露端倪,为处理旧题材提供了新工具。在《缔造》中可以看到许多当时还很新颖的理论的痕迹,其中包括政治学的政治文化理论、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和意义阐释、心理学的观念与行为关系的理论,以及现代化理论中传统与现代两分的观念模式。伍德个人的禀赋和努力无疑也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个没有数据库、缺乏电子检索手段、许多资料尚未整理出版的时代,伍德依靠实地寻访和手工操作,几乎搜罗了涉及革命时期政治思想的所有重要文献。《缔造》一书所用材料之丰富多样,常令读者惊叹不已。更重要的是,《缔造》讨论的问题十分庞杂,头绪至为繁多,如果没有高超的驾驭本领和缜密思考的能力,恐怕很难构筑出一个如此庞大而条贯的论述体系。

当然,伍德还得益于贝林的影响和指导。伍德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贝林

---

<sup>①</sup> Ruth H. Bloch, "The Constitution and Culture,"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Third Series, Vol. 44, No. 3 (Jul., 1987), 550.

正在构思和写作《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将在美国革命史和政治史的范式转变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伍德的选题和思路无疑受到了贝林的启发，在写作中也得到过贝林的点拨。而且，在《缔造》成书之前，伍德又读到了贝林的新书。贝林似乎也把伍德视为自己的得意弟子，后于伍德进入贝林门下的另一位普利策奖得主杰克·雷科夫，在若干年后还记得，他入学后不久，贝林就要他去哈佛档案馆调阅伍德的博士论文。<sup>①</sup>

关于《缔造》的书评数量之多，评论者的学术地位之高，书评分布的刊物之广，对于一部新手的“少作”而言，都可以说是十分罕见的。当时许多活跃的早期史名家，不论其学术路径和观点如何，也不论他们对这本书持何种评价，都不吝笔墨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梅里尔·詹森、佩奇·史密斯和 J. G. A. 波考克等人。将近二十年后，在美国宪法制定两百周年之际，美国早期史权威刊物《威廉—玛丽季刊》组织了一个专栏，集中讨论伍德的《缔造》。该刊编者在按语中谈到，《缔造》自出版后就成了探索美国革命和建国时期政治思想的“航标”，为此后的研究“设定了步调，提供了标杆，充当了讨论的目标”，堪称“一部现代经典”。<sup>②</sup> 为这个专栏撰文的作者，大多是美国早期史领域的一流学者，他们虽然对《缔造》提出了各种批评和商榷，但没有人否认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缔造》首要的学术意义，在于拓展了美国革命史研究的路径。美国革命是美国史研究的经典课题，在一定程度上说，一部美国革命的史学史，能够反映美国整个史学演变的历程。在长期以来对美国革命的研究中，形成了两条很不一样，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路径。

第一条是政治经济研究的路径。二十世纪初年，美国史学中出现了第一个专业史学流派，即“进步主义学派”。进步主义史家把眼光集中在革命时期社会内部的变动上，从经济，特别是经济利益的冲突着眼来讨论美国革命的

---

① Jack N. Rakove, “Gordon S. Wood, the ‘Republican Synthesis,’ and the Path Not Taken,”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Third Series, Vol. 44, No. 3 (Jul., 1987), 617.

② “Editor’s Note for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Third Series, Vol. 44, No. 3 (Jul., 1987), 549.

起因及其所造成的变化,力图为理解美国革命的意义找到一条拨云见日、鞭辟入里的途径。梅里尔·詹森及其弟子发展和深化了进步主义的冲突主题,通过对革命中各种政治派别和政治主张的阐述,进一步凸显了美国革命作为一场“内部革命”的意义。他们的研究旨在探明经济地位、职业、居住地点等要素与革命起源和进展之间的关系。

另一条研究路径特别重视意识形态的意义,其代表人物就是贝林和伍德。他们真正开始把美国革命作为一场思想革命对待,其著述在很大程度上“重新界定”了美国革命的内涵和意义。首先,他们把美国革命视为一场思想革命,在以往关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讨论之外,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揭示了美国革命对美国乃至世界政治思想的影响。其次,他们就美国革命的思想来源做了新的探讨,不再简单地把美国革命看成是启蒙思想的产物,也不再把约翰·洛克当成美国革命的“教父”;他们发现,美国革命者的思维方式和核心范畴同英国的政治反对派传统有着直接的关联,革命者理解当时的政治世界的主要理论资源来自辉格派思想。第三,他们对美国革命的性质有新的理解,认为是共和主义赋予美国革命及革命时期的美国以显著的特征;这就意味着他们在自由主义的解释范式之外,创立了共和主义的解释范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共和综论”。最后,他们开辟了解释美国革命的新路径,关注观念和行为的的关系,通过对革命者的思想世界的探讨来理解革命的兴趣、过程和后果。这也就是美国革命史研究的意识形态路径。<sup>①</sup>

这种研究路径并不是贝林的首创,但贝林不仅以精深的研究提升了美国革命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而且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方法论,展示了这一路径的魅力和潜力。在讨论这一研究路径时,人们通常把贝林和伍德并举,而且把伍德的研究看作贝林路径的延伸。其实,在新的美国革命史研究范式的形成中,伍德所起的作用和贝林一样也是不可替代的。

---

<sup>①</sup> Robert E. Shalhope, "Toward a Republican Synthesis: The Emergence of an Understanding of Republicanism in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 Vol. 29, No. 1 (Jan., 1972), 49—80; Daniel T. Rodgers, "Republicanism: The Career of a Concept,"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9, No. 1 (June, 1992), 16, 17—20.

贝林关于美国革命的思想意义的判断,只有在伍德的《缔造》问世后才变成了一个得到实证研究支撑的结论。在伍德看来,美国革命所留下的最大遗产是思想性的,而不是制度性或物质性的。革命推动了美国核心价值的形成,塑造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特征。伍德后来谈到,美国革命为美国人的自我界定和身份认同提供了不会耗尽的资源:“由于合众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身份往往是流动和难以捉摸的,因而我们美利坚人不得不反复地回顾革命和建国时期,以便弄懂我们是谁。”伍德觉得美国革命是一种阿伦特式的“开端”,它不仅构成美利坚人国民意识的来源,而且是他们进行国家身份的界定和重新界定的指路明灯,因为“做一个美利坚人,不是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要信奉点什么样的东西”,而且,“我们关于自己是自由世界领袖的观念,始于1776年”。作为一场思想革命的美国革命,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乃是“共和主义的革命意识形态”;因为有了它,美国革命才超越了一般的殖民地反叛;也因为有了它,美国革命才创立了一种以追求自由为精髓的“美利坚理念”。<sup>①</sup>

伍德不仅继承和拓展了贝林的论题,而且在学术和思想上逐渐形成了不同于贝林的特点。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是,他对美国革命的性质和意义的看法与自己的老师大相径庭。贝林针对进步主义史家,特别是J. 富兰克林·詹姆森的说法,突出强调美国革命不是一场社会革命:“在任何明显的意义上说,美国革命都不是按社会革命来进行的。也就是说,没有人刻意采取行动去摧毁,甚至去实质性地改变他们所熟知的社会秩序。”<sup>②</sup>显然,贝林为了强调美国革命的思想意义,不惜采用一致论学派的语调,刻意抹去它的社会内涵。伍德却认为:“美利坚的革命不是一场简单的殖民地对英帝国的反叛,它是一场最深刻的社会革命。……所有坚持独立和共和主义的美利坚人,都注定不可避免地期待或希望美利坚社会至少发生某种程度的变革。”<sup>③</sup>在伍德看来,“信念和态度的领域”也并不是孤立自足的,它与社会领域发生交叉

---

① Gordon S. Wood, *The Idea of America: Reflections on the Birth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11, 2—3, 320, 321, 322, 335.

②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302.

③ 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91.

混合:观念的变化与社会构成的变化密切相联,观念的变化赋予社会变化某种特征。

贝林、伍德以及其他一些从意识形态着眼解释美国革命的学者,有时也被称作“贝林学派”。他们一直受到詹森及其弟子的质疑和挑战。“詹森学派”并不否认意识形态的作用,只是更看重收入来源、职业认同、地理位置和实际经济问题对于社会态度和政治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在几次纪念美国革命两百周年的学术会议上,两派的辩论和交锋趋于激化。<sup>①</sup>虽然“贝林学派”和“詹森学派”的争论涉及理念、路径、材料和方法等各方面的分歧,但在外人看来,这两种研究路径其实各有侧重,对于理解美国革命及其意义有着显而易见的互补性。而且,正是两派的竞争推动了美国革命史研究的不断深化。

在“政治经济学派”的挑战之外,“共和综论”还招致了许多其他的批评。有的学者认为,贝林和伍德夸大了北美意识形态的统一性,用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遮蔽甚至抹煞了其他并存或共生的意识形态。有的学者否认革命前夕的北美思想中存在一种单一的、铁板一块的政治意识形态,而且认为,在革命时期也没有一种可以被准确地描述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单一而统一的文化。<sup>②</sup>英国学者 J. C. D. 克拉克进而提出,在革命中发挥动员和引爆作用的观念来自多样化的教派话语;法律和宗教是革命的中心议题,两者通过宗教而结合在一起,自由的语言即来自这两个彼此联系的领域;因之美国革命没有统一的思想渊源,共和主义并不是美国革命的思想旗帜。<sup>③</sup>乔伊斯·阿普

---

① Michael Kamme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s a *Crise de Conscience*: The Case of New York,” in Richard M. Jellison, ed., *Society, Freedom, and Conscience: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Virginia, Massachusetts, and New York*, New York: W. W. Norton, 1976, 127.

② Robert E. Shalhope, “Republicanism and Early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 Vol. 39, No. 2. (Apr., 1982), 336—356; Alfred F. Young, “American Historians Confront ‘The Transforming Hand of Revolution’,” in Ronald Hoffman, and Peter J. Albert, eds., *The Transforming Hand of Revolution: Reconside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s a Social Movement*, Charlottesville: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5, 421—422.

③ J. C. D. Clark, *The Language of Liberty 1660—1832: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Social Dynamics in the Anglo-American World*,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 22.

尔比则从方法论的角度质疑贝林和伍德的研究。她觉得革命者的行动来自一种革命的意识,一种特定的心态,它使人放弃常规的行为准则,而把非常之举视为正常,但共和派传统本身并不具备产生这种反应的力量。因此,必须考虑究竟是什么社会境况使很大一部分殖民地人觉得,他们对确切恐惧的反应是正当而合法的。<sup>①</sup> 弗里斯特·麦克唐纳则对意识形态学派提出了更尖锐的批评,指责他们未能区分各色各样的美利坚人所信奉的各种不同的共和主义,也不明白这些共和主义在总体上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社会和经济规范的差异;片面注重公民人文主义的传统,完全没有考虑苏格兰思想家的影响,而且在贬低洛克的影响时又忽略了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理论的影响,也不太重视法律和合法制度的作用;很少提及通常所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实际”,也淡化了华盛顿、罗伯特·莫里斯这样的实干家的作用;虽然指出了共和美德与奢侈(邪恶)之间的紧张,但没有充分讨论“社群共识”和“占有性个人主义”之间的张力。<sup>②</sup> 此外,还有一些史家力图还原被贝林和伍德所边缘化的洛克的地位,从新的角度论证洛克对美国革命的影响。<sup>③</sup>

对意识形态学派的批评一直延续到今天。在新近出版的一本讨论革命时期公民权的著作中,其年轻的作者又把意识形态学派抬出来作为立论的靶子。他认为这些史家贬低了围绕“国家工具”的斗争的决定性意义,而且,他们经常采用一些很大的比喻(如“contagions of liberty”之类)来表述独立后革命的影响,但这些比喻在揭示一些东西的同时,也遮蔽了不少;它把革命“拟人化”,而忽略了革命中各色各样的行动者。<sup>④</sup> 不过,这类批评从反面表明,意识形态学派研究美国革命的路径和方法,至今仍能给学术灵感带来某

---

① Joyce Appleby, “Liberalism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 Vol. 49, No. 1 (Mar., 1976), 5—7.

② Forrest McDonald, *Novus Ordo Seclorum: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Constitution*,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85, viii.

③ Steven M. Dwoletz, *The Unvarnished Doctrine: Locke, Liberalism,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Alex Tuckness, “Discourses of Resistance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64, No. 4 (October 2003), 547—563.

④ Douglas Bradburn, *The Citizenship Revolution: Politic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Union, 1774—1804*,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9, 15.

种刺激。不论是追随者还是挑战者,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意识形态范式的启发。<sup>①</sup>

从更广阔的学术语境着眼,《缔造》对政治史研究的重新定向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从总体上说,《缔造》发展了贝林在《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中开创的路径,把陷入困境的美国政治史研究引领到了政治文化的路径上,推动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范式转变。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种范式转变一度给早期政治史研究带来了勃勃的生机。

“政治文化”一词最初出现于1956年,<sup>②</sup>经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加以界定,遂成一个常见的政治学概念。阿尔蒙德把“政治文化”理解为某种政治系统根植于其中的“为政治行动定向的具体模式”,并强调它与“政治态度”“政治价值”“国民性格”或“文化精神”并不是一回事。塞缪尔·比尔和亚当·乌拉姆在1958年对“政治文化”做了不同的界定:“在一个社会的一般文化中,有某些方面专门涉及政府应当如何办事和应当办什么事。我们把文化的这个部分叫作政治文化。如同社会的一般文化一样,政治文化的主要成分包括价值、信念和情感态度。”<sup>③</sup>1965年,政治学家悉尼·维巴进一步把政治文化中的“定向”分解为“认知定向、情感定向和评价定向”,或简化为“认知、情感和评价”。<sup>④</sup>美国政治史家受到政治学理论中这种新发展的启发,把“政治文化”的概念引入历史研究,并吸收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相關理论,开始探讨过去世界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态度的变化。

贝林在这方面有开拓之功。他在1967年出版的《美国政治的思想意识

---

① Shalhope, “Republicanism and Early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336—346.

② 是年, H. 芬纳(H. Finer)出版的《大欧洲诸强国的政府》(*Governments of Greater European Powers*)一书有个附标题,英文为“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Governments and Political Culture of Great Britain, France, Germany, and the Soviet Union”,但他没有对“political culture”(政治文化)这个术语做出界定。

③ Young C. Kim,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26, No. 2 (May, 1964), 320, 324.

④ Lowell Dittmer,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Symbolism: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World Politics*, Vol. 29, No. 4 (Jul., 1977), 553.



渊源》中,用了“政治文化的来源”这样的标题,意在把对美国革命的背景和起因的解释引向革命发动者和参与者的内心世界,探讨他们看待和思考当时政治世界的方式,理解他们反英和革命的动机与诉求。<sup>①</sup>在随后出版的《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以下简称《渊源》)中,贝林把这种理念贯彻到关于美国革命起源的实证研究中,开创了从政治文化着眼来阐释美国革命的新路径。<sup>②</sup>这在当时的美国政治史领域,无疑是一种革命性的尝试。当然,贝林这样的历史学家所用的“政治文化”概念,同政治学家相比有很大的模糊性和扩展性,正如新政治史名家罗纳德·佛米萨诺所说,许多政治史家在面对“定义难题”时,往往巧妙地采取不讲定义的策略,而通过用法和潜在的解释框架来显现他们对“政治文化”的理解。<sup>③</sup>

伍德在谈到自己研究的主要考虑时说,他发觉在解释美国革命和制宪时涉及的许多“史学问题”,均缘于未能很好地把握革命时期政治文化的鲜明特征。<sup>④</sup>这表明,“政治文化”乃是他切入美国革命的基本路径。较之贝林的开拓之功,伍德的发展首先体现在题材的扩展上。他沿着贝林的路径来讨论整个革命期间政治文化的变动,发展和完善了共和主义的解释范式。同贝林一样,伍德把关注的对象由政治理论家转向了政治行动者,于是就使研究路径和论述方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样做有一个潜在的预设:从事具体政治活动的人不仅在行动,同时也在思考;他们对行动的理由和目标的表述,绝不仅仅是一种表演、辩解或宣传,其中包含了真实的想法,从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希望、理想、担忧和焦虑;考察他们的想法、态度和诉求,有助于理解其行动。相对说来,贝林在《渊源》中关注的只是若干个小册子作者,而伍德的《缔造》所涉及的人数量更多,身份更为复杂多样。讨论对象的增多,导致材料更加繁多和驳杂。跟经典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相比,政治文化研究所处理的题材具有“众声喧哗”“变动不居”的特点。对同一个问题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同一

---

① Baily,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Politics*, 3—58.

② Baily,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③ Ronald P. Formisano,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Culture,”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31, No. 3 (Winter, 2001), 393, 394.

④ 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viii.